

# 会员通讯

2017年第6期

(总第72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

2017年7月11日

## 目 录

### 工作动态

- 第九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在京召开 ..... (2)  
第九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联合声明 ..... (5)  
国经中心举办第九十六期经济每月谈 ..... (14)

### 权威言论

- 魏礼群：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历程和经验 ..... (16)  
张晓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以改革为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 (31)  
郑新立：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 (37)  
魏建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建设道路 ..... (45)  
陈文玲：走向中美关系新时代 ..... (50)  
成果摘要 ..... (59)  
国际交流 ..... (63)

[工作动态]

## 第九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在京召开

2017年6月20日至21日，第九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在北京举行。双方代表围绕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后双边经贸关系发展新路径展开了坦诚对话，内容涉及中美经贸“百日计划”、基础设施、双边投资、产能合作、数字经济等议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以及中美两国工商领袖、政府前高官及专家学者共34名代表参加了对话。



中方代表表示，去年以来，世界经济温和复苏，社会思潮深刻演变，当前全球政治上出现的问题大于经济上的问题，给未来发展

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处理好中美关系，不仅对两国至关重要，对世界的发展与稳定也将产生重要影响。两国元首通过庄园会晤，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这为中美关系发展注入了稳定剂，使人们的担心有所降低，增强了未来的正面预期。中美两国都有良好的发展愿景，习近平主席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特朗普总统的口号是“使美国再次伟大”。希望这两个“伟大”能够互补、契合，更好地实现对接，为开创一个惠及全球的伟大时代而共同努力。

在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中，双方就农产品贸易、金融服务等领域表示出强烈的合作意愿，并在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形成实际成果，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也应看到，中美经贸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关系，一百天的谈判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如何推进，考验着双方的智慧。在这样的时刻，双方应坦诚相见，推动经济务实合作，促使两国相向而行，走共同发展道路。

美方代表表示，中美经贸合作的互补性强。进一步扩大双边经贸合作将使双方获益，也有利于世界经济平稳增长。美国工商界将继续致力于扩大两国贸易、投资等合作，促进双边经贸关系健康发展。

双方还就特朗普对外经贸政策、中美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对话结束时，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呼吁两国领导人进一

步开放国内经济，为全球自由公平贸易与投资提供更有力的支持。特别是，为高新技术、互联网经济、制造业、金融服务、油气合作、能源产品交易，环境友好型技术、基础设施可持续建设、医疗卫生等领域提供贸易投资便利，进一步密切和扩大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关系，使两国企业界和公众从中获益。双方一致认为，应以战略眼光处理好中美关系，确保合作而非分歧主导这一 21 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双方建议，应采取有效措施，促进贸易投资、共同努力加强多边贸易体系，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促进创新产业、数字经济和网络安全，加强能源环境合作。双方决定开展多方式活动，包括交流金融服务、信息与通讯技术安全等领域的成功经验，加强“一带一路”框架内及其它途径的投资合作，促进数字经济和贸易发展，来促进两国经贸关系发展。

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美国全国商会联合举办，旨在搭建中美工商领袖、前高官及学者之间沟通交流平台，扩大中美工商界对话渠道，被称为“二轨”交流机制。自 2011 年 3 月在北京举办第一轮对话以来，已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八轮会议。

# 第九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

## 联合声明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简称“国经中心”）和美国全国商会（简称“全美商会”）于2017年6月20-21日在北京共同主办了第九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本轮对话举行的背景，是今年4月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海湖庄园所举行的富有成效的会晤，双方也就此启动了“中美全面对话”这项全新机制并同意实施“百日计划”。这些成果为中美关系发展注入了稳定剂，有利于引导两国关系朝着更具建设性和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国经中心和全美商会重申前八轮对话中形成的共识，一致认为本对话机制是中美两国工商界领袖最重要的交流平台。双方期待“百日计划”形成实际成果，并促请两国政府向着同一个目标努力，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减少贸易与投资壁垒，推动两国经济开展务实合作。

双方代表一致认为，当前两国工商界有必要促请各自政府以全面的眼光看待中美双边贸易与投资，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推进市场开放，加强经济政策协调与信息分享，减少双边贸易与投资中的障碍与限制，同时探索包括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在内的合作新领域，不断创造实现双赢的新机会。

双方代表强调，中美两国经济在很多方面都高度互补，中美经

贸关系仍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压舱石”，中美经贸关系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繁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美贸易与投资不是“零和”博弈，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给予国内企业优于外资企业的待遇，有可能导致双边经贸关系螺旋式下滑，严重影响经济增长与就业，进而波及全球经济。

国经中心和全美商会向两国领导人呼吁，应进一步开放国内经济，为全球自由公平贸易与投资提供更有力的支持。特别是，为高新技术、互联网经济、制造业、金融服务、油气合作、能源产品交易，环境友好型技术、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提供贸易投资便利，进一步密切和扩大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关系，使两国企业界和公众从中受益。

国经中心和全美商会促请两国政府采取以下措施：

## 一、整体关系

以战略眼光处理好中美关系，确保由合作而非分歧来主导这一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继续关注新建立的“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框架之下产生的各项具体成果，利用最有效的和现有的双边机制，包括中美商贸联委会及其各工作小组，进行交流，取得成果，以便及时、有效地落实已达成和即将达成的各项承诺。

## 二、贸易和投资

1、反对两国及其他国家采取进口替代、不合理的高新技术出口

管制、分散型的监管政策和保护主义政策，减少各类贸易壁垒，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向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

2、加快消除投资壁垒和歧视性投资政策，构建更加开放、透明的投资环境，依法公平公正对待所有投资者，确保两国投资者能够获得更对等的投资机会，并可以充分竞争；

3、共同研讨全球运输和海关管理领域的成功做法和新经验，包括单一窗口系统的应用和更简化的低值货物通关手续；

4、力争尽早完成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探索在适合的条件下启动更广范围的中美投资与贸易协定（BITT）谈判。

### 三、多边贸易体系

1、共同努力加强多边贸易体系，提高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在全球的重要地位和有效性；

2、确保世贸组织有足够的资源履行职责，并继续作为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有效途径；

3、支持区域、多边及其它各类促进贸易投资的协定；

4、进一步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

### 四、金融市场化改革

1、金融业发展有利于推动两国经济增长，促进双向贸易与投资，提高配置资源效率，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应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改革；

2、加强两国金融合作，扩大市场准入，提供国民待遇，向消费

者提供包括银行业务、债券、保险和电子支付在内的更多选择。

## 五、 创新产业、数字经济和网络安全

1、在充分考虑各自合理国家安全关切的条件下，放宽高新技术领域出口限制，创造有利于增强两国创新产业合作的政策环境；

2、两国创新领域共同利益日益增多，重大合作事项不断拓展，对此应充分肯定；加强知识产权合作，全面加强包括专利、商标、商业秘密、版权等知识产权领域的保护和执法，确保双方企业创新收益不受损害；

3、确保不依知识产权或制造商国籍设定贸易和投资限制，促进两国在新技术领域的创新与合作；坚持非歧视性原则，消除跨境流通等领域的数字贸易壁垒，为双方信息与通讯技术（ICT）企业创造互利共赢机会；

4、促进先进制造业的发展，鼓励对可持续生产工艺的创新和投资；支持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执法以便制造产品进行互利互惠的创新开发；共同努力为制造业创造最有利的环境，包括监管合作；

5、提高医疗产品与服务领域监管、价格和相关政策的透明度；

6、推进落实 2015 年 9 月双方领导人达成的不实施、不支持为获取商业利益窃取网络商业信息的共识，努力使该问题不再成为双边关系中的关切议题。

## 六、 能源和环境

1、减少针对各类能源企业和技术的贸易与投资壁垒；

2、推动天然气和其它清洁能源的使用，继续推进油气上游行业的国际合作，深化定价机制市场化改革，以及天然气输配和下游行业的改革；

3、全面推进以清洁技术、绿色金融为重点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合作。

国经中心和全美商会一致认为，双方创建新模式，开展项目对接和务实合作，对两国经贸关系发展意义重大。双方愿意向两国高层展示合作成果，为实现共同目标提供有力支持，为此决定开展以下活动：

### **一、交流金融服务领域信息与通讯技术（ICT）安全成功经验**

金融服务对全球经济安全至关重要。当前安全风险、隐私泄露、知识产权侵权等网络犯罪规模和频率不断增加，中美两国政府对此已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但做法不尽相同。双方认为以建设性态度和有效方法应对以上问题，可以提高 ICT 在金融服务这一关键领域的整体安全性，实现中美双赢。

#### 下一步行动：

未来 12 个月内，国经中心和全美商会将在中国或美国组织一场专题研讨会，分享涉及金融服务中 ICT 安全领域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与会代表将包括来自双方企业和行业内专家，以及政府监管部门人士。研讨会后双方视情况决定是否及如何继续进行这一交流。

## 二、加强“一带一路”框架内及其它途径的投资合作

投资是推进中美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中美相互投资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带来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将极大地扩大中美投资空间，为中美第三国合作创造了大量机会。美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广泛参与，积极同中国企业开展合作，可以为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做出新贡献。美国企业在一些领域可以提供全球领先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助于“一带一路”项目的顺利实施和高效完成。

美国基础设施建设将催生大量投资需求，美国新政府已将其作为工作重点。中国在市政道路、高速公路、立交桥、高速铁路和港口项目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具有较强的能力和成本优势，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愿意为此提供融资、货物和服务。中方投资美国基础设施建设某些领域将有利于进一步密切双边经贸关系，在某些情形下有助于加快一些急需项目完工，降低建设成本，提升总体效率。

双方同意推进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内以及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世界银行等多边投融资机构等途径开展充分合作。

### 下一步行动：

未来12个月内，国经中心和全美商会将在中国或美国举办一次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会议，中方将向美方介绍“一带一路”计划主要内容及进展情况，推介适合美方参与的项目，双方探讨可以共同

开展的合作项目。美方将向中方介绍美国基础设施建设最新情况，就中方企业如何参与美国基础设施振兴计划提出意见和建议。

### 三、促进数字经济和贸易发展

#### 1、跨境数据流动

与会代表认同双方加强跨境数据流动监管领域政策协调的必要性。鉴于目前对有关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方面的关注，双方认为应共同加强跨境数据流动，增强两国行业对数字经济的信心和信任。

##### 下一步行动：

国经中心和全美商会将举办一次关于两国间跨境数据流动监管的专题会议或研讨会，就电子商务、跨境支付、电子认证、在线交易以及信用体系建设等话题进行讨论。

#### 2、促进物联网发展

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全方位的变革。电子政务、医疗健康、交通运输、市政网络、建筑集成管理及其他领域，都可以从信息与通讯技术的智能应用中受益。中国致力于推进城市化，中美两国都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推进信息和通讯技术发展，加快物联网发展，对中美两国都非常重要。

##### 下一步行动：

国经中心和全美商会将在未来 12 个月内在美国或中国组织一场专题研讨会，邀请来自企业界和政府专家代表参加，讨论信息和

电信技术的智能与安全应用，具体包括以下领域：

物联网

现代智能运输、物流

先进制造业和资源效率

电子政务

医疗健康

能源管理，包括自动需求反馈及相关技术，帮助建筑管理人员和租户获得更加智能的服务、数据，并更好地控制设施运行

公用事业的智能仪表及软件

云服务

### 3、贸易便利化的成功经验

电子商务为中美扩大贸易，特别是中小企业间贸易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美都有国际知名的电商企业，进一步推动电子商务便利化将使其从中受益。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实施为中美深入探讨贸易便利化，特别是简化低值货物通关手续方面的成功经验，提供了机遇。

#### 下一步行动：

国经中心和全美商会将组织两场专题研讨会，邀请两国主要电商企业及相关政府部门代表参加，讨论数字经济贸易便利化的成功经验与做法。会议将重点讨论技术和数据在促进和保障跨境电子商务方面的作用，包括单一窗口清关系统和简化低值货物通关手续的

作用。

#### 4、多边贸易体系

世贸组织自 1995 年成立以来，一直是实施全球贸易规则，解决贸易争端的核心机制。世贸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后，成为多边贸易谈判的首要渠道。

但世贸组织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有些国家对全球贸易体系中明显过渡使用贸易救济措施表示关切。有些国家则担心，世贸组织无法有效抑制一些国家参与影响贸易条件的制定，也不能有效限制允许政府推行扭曲贸易竞争政策的规则中的例外。由于世贸组织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已经失败，主要成员国家贸易政策的重点已经转向谈判缔结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与此同时，世贸组织上诉机构也表示担心，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财力应对越来越多的上诉案件。

#### 下一步行动：

国经中心和全美商会将组织一场关于多边贸易体系未来的专题研讨会，重点讨论上述问题。会议将邀请中美两国专家讨论双方在加强多边贸易体系、提升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在全球范围的突出地位和有效性等方面的合作机遇。会议还将探讨中美两国将如何共同努力，以确保世贸组织有足够的资源履行使命，继续有效解决国际贸易争端。

# 国经中心举办第九十六期经济每月谈

2017年6月22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第96期经济每月谈，会议主题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研究成果发布”。会议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王春正主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副秘书长范恒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地区司原巡视员陈宣庆先后发表演讲。



张晓强介绍了目前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研究的基本情况，包括相关文件依据、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的有利条件、目标、具体内容及重大意义，同时也指出了大湾区城市群建设面临创新、区域交通以及生态环境压力等问题和挑战。未来大湾区建设构建“一环两扇、两屏六轴”的空间布局，必须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体制

机制和两岸三地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目标。

范恒山认为，大湾区建设规划研究把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意义又提高到了规律性认识。他建议，在规划过程当中，要体现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原则，首先要把软硬基础条件的建设放在优先和突出重要位置，其次要在一体化发展格局下体现区情要求和比较优势，第三要有效促进创新资源的集聚和整合，第四要把握城市群的构架来推动城市创新发展，第五要集中发挥功能平台的探索与示范作用，最后要全面融入全球经济竞争与合作。

陈大庆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研究工作的基本思路做了介绍。他表示，这项研究是以合作发展为主题，以创新发展为主线，以跨区域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为重点，以世界一流湾区和城市群为参照。大湾区的建设要注重现实性、前瞻性、包容性和连续性。并对大湾区城市群“一环两扇、两屏六轴”空间布局及发展重点和具体保障措施内容做了说明。

演讲结束之后，专家们回答了媒体和听众提出的问题。国经中心部分研究人员及会员单位、企业、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人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权威言论]

##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历程和经验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魏礼群

(2017年5月)

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中国改革发展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体制改革包括行政权力结构变革、行政组织机构调整、行政管理制度以及行政手段方式创新等。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行政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回顾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伟大历程和宝贵经验，研究探讨继续推进改革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对于深刻认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 一、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背景

行政体制是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发展阶段，决定着一定的行政体制。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离不开中国特定的行政框架、经济社会改革不断深化以及国际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 (一) 新中国成立后30年行政体制的演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探索建立新型的行政管理体制创造了条件。1951年政务院作出《关于调整机构紧缩编制的决定（草案）》，进行了新中国成立

后第一次精兵简政工作。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宪法》，选举了国家主席，成立了国务院，形成了新中国基本的行政体制框架。从1954年年底，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对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精简。1956年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关系，同年召开的全国体制会议提出：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首要步骤，是先划分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行政管理职权，并且对地方的行政管理权予以适当扩大，然后再逐步划分省和县、县和乡的行政管理职权。这次改革一直持续到1960年。20世纪60年代初期，为适应国民经济调整的需要，进行了“精简加集中”的行政体制改革。20世纪60、70年代，行政体制在中央和地方分权以及政府部门增减方面多次调整。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行政体制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一是初步构建了与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要求相适应的行政管理模式；二是创建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体制；三是积累了中国行政体制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可以说，这一历史时期的行政体制发展历程尽管有不少曲折，但探索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关系，实施了精兵简政，调整了政府机构设置，建立了社会主义行政体制基本框架，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这一历史时期的行政体制建设，为改革开放后的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基本前提和重要借鉴，其中最根本的教训就是不能超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相应的客观条件，而一定要从本国国情和实际情况出发，着眼于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稳步加以调整和变革。

## （二）改革开放以来行政体制的变革

1978年底，中国拉开了伟大的改革开放历史序幕。此后，从农

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挡。开放从对内到对外、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进程波澜壮阔。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有效地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使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显著提高。特别是中国经济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全面小康，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持续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事业，为中国行政改革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基础支撑。

### （三）国际行政改革理论与实践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际行政改革理论与实践取得了积极进展，相继出现了以新公共管理运动、公共选择理论和治理理论为代表的政府行政改革理论，并在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取得了很大成功。国际行政改革理论和实践的主要内容与措施有：一是政府职能的优化。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是当代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府改革的重点之一。在新公共管理运动视野中，政府从大量社会事务中解脱出来，将这些职能交给或归还社会，由社会经济组织或中介组织去承担，政府则制定法律和规章制度，监督和执行法律法规。二是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

社会化。即政府充分利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推行公共服务市场化和社会化。三是分权。当代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目标之一在于分散政府管理职能，缩小政府行政范围，因而必然要求实行分权与权力下放。四是引入现代化管理技术。“重塑政府”，实现政府管理的现代化，建立一个“市场化”“企业化”政府。中国行政改革理论与实践，在借鉴国际最新行政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进行。虽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行政体制，由于政治、历史、文化等原因，其改革路径不可能相同，不可能照抄、照搬国际行政改革的模式，但国际行政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中国开阔眼界、打开思路，具有积极的启迪意义。实际上，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正是在借鉴国际行政改革理论与实践有益做法的基础上，不断探索、不断深化，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行政改革之路。

## 二、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历程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近40年的大改革大开放，使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按照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根本要求，坚持不懈地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并不断取得新突破和重大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不断变革与完善。近40年来中国行政体制变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 （一）冲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1978—1992）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党的十四大之前，主要是冲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模式，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行政体制进行积极探索。1982年和1988年实施了两次集中的行政体制改革。1982年进行的国务院机构改革，重点是适应工作重点转移，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精简调整机构。国务院部门机构改革完成后，进行了地方机构改革，重点是精简庞大臃肿的机构，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能。1988年实施了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简机构和人员，提高行政效率。总体上看，通过这一阶段的改革，初步摆脱了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管理模式的羁绊，激发了经济社会活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 （二）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体制（1993—2012）

从党的十四大召开到党的十八大之前，主要是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不断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1993年和1998年实施了两次集中的行政体制改革。199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一是转变职能，推进政企分开。二是明确部门职权，理顺权责关系。着力理顺国务院部门之间尤其是综合经济部门之间以及综合经济部门与专业经济部门之间的权责关系，调整中央与地方权限。三是精简机构，压缩人员编制。1998年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进一步调整部门职能。二是进一步精简机构编制。

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推进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改革全方位深化。重点围绕构建有利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体制机制，着力进行制度机制创新和管理方式创新。主要包括：注重以人为本，

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注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大力推进科学民主决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注重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加快以改善民生和公共服务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增强社会创造活力；注重规范政府行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注重改进管理方式，推进政务公开和电子政务，探索实行行政绩效管理制度。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到 2020 年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目标，此后，行政改革取得了新突破。政府职能转变取得积极进展，在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方面迈出新步伐，集中解决了在宏观调控、资源环境、市场监管、文化卫生等方面 70 余项部门职责交叉和关系不顺问题。

### （三）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2013 年之后）

这一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行政体制改革围绕这一总目标，加快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主线是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

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 三、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是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下，对行政体制的性质、特点、规律、关系、目标和任务不断深化认识和逐步推进的探索过程，也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探索过程。实践证明，这个时期的改革和探索取得了很大成功，从根本上摒弃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模式，基本上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体制。其主要内容是：

#### （一）转变政府职能

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求转变政府职能，这不仅是贯穿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历程中的一条主线，也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党的十四大提出，转变政府职能的根本途径是政企分开；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政府职能主要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更是紧紧扭住政府职能转变这个“牛鼻子”，以简政放权为突破口，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切实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通过近 40 年的行政体制改革，中国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明显减少，企业作为市场竞争主体地位得到确立，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明显增强，新型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健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加强。

#### （二）调整行政区划

行政区划的调整与优化，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城镇化进程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先后进行了包括建立特区、新建省（直辖市）、撤地建市、县改市、市领导县、县改区等一系列行政区划改革，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行政区划的实践内涵。受城镇化进程、中心城市空间拓展、人口集聚与增长、交通和通信条件改善以及政策因素，中国行政区划调整主要有五种模式：建制变更、行政区拆分、行政区合并、建制升格以及新设立行政区。其中，撤县设市的行政区划调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一种行政区划调整模式。从 1979 年开始到 1997 年暂时结束，这一时期中央两次设市标准的调整，极大地影响了区划变更的进程和周期。

### （三）改革政府组织结构

机构是职能的载体，职能配置需要科学的机构设置来履行。改革政府组织机构，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先后进行了 7 次大的政府组织机构改革，总的趋势和要求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和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的需要，明确划分、合理界定政府各部门职能，不断理顺行政组织纵向、横向以及部门之间的关系，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通过合理调整机构设置，优化人员结构，既要解决有些部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问题，又要解决有些部门因职能加强而出现的编制过少、人员不足问题，做到职能与机构相匹配、任务与人员编制相匹配。2008 年政府机构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积极推进大部门改革。这次改革对职能相近、管理分散的机构进行合并，对职责交叉重复、相互扯皮、长期难以协

调解决的机构进行合并调整。同时，对职能范围过宽、权力过分集中的机构进行适当分设，以改变部门结构失衡和运行中顾此失彼的现象。2013年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进一步优化了部门设置，协调了部门关系，不断完善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统一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建立了以宏观调控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为主体的政府机构框架，机构设置和职责体系趋于合理。可以说，每次政府组织机构改革都是由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以适应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为目标，对行政管理体制进行调整与改革。

#### （四）创新政府管理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主动适应国内外环境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断创造行政管理方式，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利用市场机制，采用现代科技成果，简化行政程序，调整管理流程，将政府规划、政策引导、法规制定、经济激励、信息服务等多种管理方式和手段相结合，使行政管理方式向更加科学化、人性化、简便化、效能化转变。一是创新宏观调控方式。例如，近几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积极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明确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和防通胀的上限，保障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集中精力转方式、调结构，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和微调，提高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协调性。二是将政府管理由事前审批更多地转为事中事后监管，堵塞监管缝隙和漏洞，加大对违法违规者的处罚力度，努力做到“宽进严管”，着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三是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创新政府职能方式。四是加强电子政务建设，着力推进“互联网+政

务服务”，利用电子政务平台实施管理和服务，增强了对公众诉求的回应性，提高了行政效率，降低了管理成本，方便了人民群众。

### （五）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建设法治政府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大成就，突出标志是政府逐步实现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从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法治政府转变。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法治观念不断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了显著进步。法治政府的核心是依法行政，1989年通过的《行政诉讼法》被认为是中国法治建设历程中的里程碑。2004年3月，中国政府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用1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此后，法治政府建设步伐加快，《行政许可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颁布实施。中国法治政府的法律制度框架已基本建立，依法行政的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完善，行政立法、执法和监督工作进一步加强，政府建设和行政工作法治化、制度化加快推进，着力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法治政府基本建成，行政法规不断健全，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行政执法组织体系更加健全，行政执法程序化、规范化水平明显提高，行政监督制度建设加强，行政权力运行和行政行为实施的法制化、规范化、公开化程度大幅提高。

### （六）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

公务员队伍是政府管理的主体，其素质和能力直接影响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建立现代国家公务员制度。1993年4月，国务院通过并颁布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

并于同年 10 月起施行,这标志着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初步形成。此后,全国各地自上而下逐步开始建立和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 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公务员管理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健全, 包括准入、激励、退出等机制在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务员制度基本建立; 政风建设和廉政建设不断推进, 公务员队伍整体素质和能力明显提高, 形成了一支爱岗敬业、忠于职守、素质优良、作风过硬、勤政廉政的公务员队伍, 为进一步建成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奠定了坚实基础。

### （七）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廉洁政府

廉洁是从政道德的底线, 也是政府公信力的基石。改革开放近 40 年尤其是近些年来, 中国政府坚持不懈地推进廉洁政府建设, 在查办大案要案、惩处腐败分子、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治理商业贿赂、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等方面, 取得了更大进展。国务院每年召开廉政工作会议, 对政府系统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作出部署。全国各地区、各部门都把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寓于各项改革和重要政策措施之中。通过制定建设廉洁政府的一系列法律制度, 包括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着力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通过体制机制创新, 建设廉洁政府。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 推进财政、投资、金融、资源等体制改革; 依法查处腐败案例, 大力建设廉洁文化; 积极开展反腐败国际交流与

合作。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也是世界各国政府和政党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将在国际和地区性反腐败交流与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为建设一个公正廉洁、和谐美好的世界而努力奋斗。

#### 四、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不仅取得了显著成效，而且在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经验，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 （一）坚持顶层设计，统筹规划

这既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经验，也是今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深化行政体制改革，需要放到党和国家发展的大局中统筹谋划，在中央统一领导下与其他方面的改革统筹规划部署，整体协调推进。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我们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深入调查研究，集中正确意见，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改革。”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统筹协调推进。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完善体制改革协调机制，统筹规划和协调重大改革。”这对加强行政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协调推进各方面改革有着重要意义。中国政府始终把行政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深入研究行政改革与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的相互关系，把握好各方面改革相互适应、相互支撑的规律性和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复杂性，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提高体制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权威性，

增强各方面改革措施的协调性、配套性、实效性，确保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方向和顺利推进。

## （二）坚持积极稳妥，渐进深化

行政体制改革是深化整个改革的重要环节，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在近 40 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走出了一条开拓性创新、渐进式改革的成功道路。这一改革道路的基本特点，是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框架的前提下，进行的一场有领导、有秩序、有创新的社会主义行政制度的自我完善和革命。有领导，是指行政体制改革与其它方面改革一样，坚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坚定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有组织分步骤推进。

有秩序，是指行政改革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协调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承受度，是在保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政体基础上，对行政体制进行的改革。有创新，是指既对原有行政权力结构和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也是一场深刻的观念变革和思想革命，必须把创新精神贯穿于改革的全过程和每个环节。实践证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结果。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要有长远目标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的路径与方向，确定每个时期的重点任务，改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既要充分利用各方面的有利条件，正确把握有利时机，坚决果断地推进改革，在一些重要领域迈出较大步伐，又要全面分析面临的矛盾和风险，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积极稳妥实施。

### （三）坚持服务人民，依靠群众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根本宗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推进各项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动力所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为了人民、服务人民、依靠人民，着眼于适应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维护人民群众的各项权益；充分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诉求，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从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机制看，高度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性，增强社会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实践证明，中国行政改革只有符合人民利益，反映人民呼声，紧紧依靠人民，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有力支持。

### （四）坚持围绕中心，协调推进

经济建设是中心任务，围绕经济发展，服务经济发展，适应经济发展，始终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在驱动力。行政体制是国家体制的基本框架，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体制的关键结合点，并且有着密切的联系。行政体制改革尤其是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调整，涉及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等一系列重要关系。因此，行政体制改革必须放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统筹谋划，服从并服务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做到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相适应，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相协调。

## （五）坚持鼓励创新，勇于实践

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中，始终鼓励和支持地方、部门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大胆探索，推进创新，为深化改革积累经验。近些年来许多地方和部门围绕政府组织结构、层级体系、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服务方式等进行了积极探索，包括推进大部门制改革、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政务服务标准化、综合执法体制改革等。有关部门和地方深入调查研究和客观评估这些改革效果，认真研究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使那些在实践中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得到完善和推广，并体现在顶层统筹和决策部署中。

## （六）坚持立足国情，善于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开放的胸襟，宽广的视角，大力开展中外行政文化交流，在相互学习借鉴中，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应有努力。行政改革涉及行政权力关系的调整和政府组织结构的变动，中国行政改革既善于研究借鉴国际上公共治理方面的有益成果，顺应时代发展和变革潮流，又不盲目照抄照搬国外模式。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情况差异性很大、发展很不平衡，在推进改革中，充分考虑各地特点，分类指导，做到借鉴国际经验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

（信息来源：《全球化》2017年第5期）

#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以改革为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张晓强

(2017年6月28日)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既是粤港澳地区自身调整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助推中国参与国际竞争、提高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客观要求

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了经济发展热词。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粤港澳大湾区”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正式成为国家战略。

广东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中提到：“携手港澳共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畅通三地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发展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湾区经济。”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再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进入公众视野。

在5月3日举行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研究》课题汇报会上，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张晓强率领的课题组，向广东省有关领导汇报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成为国际一流湾区，粤港澳大湾区要如何建？《南方》杂志就此对张晓强进行了专访。

## 已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的基础条件

《南方》杂志：“粤港澳大湾区”今年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上升为国家战略，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

张晓强：从全国层面考虑，中央提出粤港澳大湾区也是考虑要

在南部地区通过一些重要举措，实现全国从南到北都有自己的重要发展举措，促进全国协调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先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带一路”是内外相互的，全国都参与，不是特别聚焦在一个特定地域。京津冀协同是在华北，长江经济带是在中部偏南。在京津冀协同战略下，华北的雄安新区已经诞生。在华南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我认为也是从全国协调发展的一个整体考虑。

从现实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包含珠三角 9 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面积 5.6 万平方公里，人口 6000 多万人，2016 年经济规模约为 1.4 万亿美元，居世界经济体第 11 位。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超过 7118 万标箱，机场旅客年吞吐量达 1.86 亿人次，位居各著名湾区之首。

经过 30 多年合作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已成为中国综合实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已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

**《南方》杂志：**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对于粤港澳地区发展，乃至全国有着怎样的深远影响？

**张晓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既是粤港澳地区自身调整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助推中国参与国际竞争、提高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客观要求。

推动粤港澳合作发展，有利于培育比肩以纽约、伦敦、东京为中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新平台，配

合中国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

有利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通过区域双向开放，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广大市场，向西面向欧亚大市场，构筑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接融汇的重要支撑区。

有利于构建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

有利于探索“一国两制”下区域合作新机制，拓展港澳地区发展新空间，提升港澳国际竞争力，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不仅仅是一项区域改革发展的重 要战略，还是与“一带一路”倡议密切对接，继续推进“一国两制”伟大实践的积极举措。

### 大湾区是粤港澳合作的持续深化

**《南方》杂志：**粤港澳大湾区对比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世界一流湾区，有何共性和特色？

**张晓强：**湾区经济是基于自然港湾所属城市群或城市带所形成的特有的滨海经济形态，近些年来已经成为一种日益成熟的区域经济模式。

从全球来看，湾区多具有经济高度发达、创新资源集聚、生活环境优质、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区域发展格局功能明确等特征。很多湾区成为所在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引领地区，成为科技创新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前沿地带。

总体来看，对照世界一流湾区的发展特征，粤港澳大湾区无论是从经济规模、生活环境、交通条件、区域格局还是城市群竞争力，

都已具备成为世界一流湾区的基本特征、基础条件。当然，对比国际一流湾区，粤港澳大湾区还处在湾区经济发展初级阶段，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南方》杂志：大湾区建设，要怎么样用好港澳优势？**

**张晓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当前的泛珠合作、粤港澳合作、珠三角一体化是相互联系的。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是区域合作的深化升级，是粤港澳合作的持续深化。

长期以来，加强粤港澳合作是国家重点战略部署。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有关补充协议（CEPA）和粤港、粤澳合作框架协议下，粤港澳三地已经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格局。《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实施以来，珠三角地区一体化水平不断提升。

伴随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珠三角一体化继续向深入推进，粤港澳合作也将迈入全新阶段，粤港澳协同发展将更加顺畅。

另一个层面，中央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不仅寄望这一地区的发展，还希望这个世界级城市群作为龙头，带动粤港澳发展，进而带动整个泛珠地区的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的主题是合作**

**《南方》杂志：**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作为国家高端智库，也参与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编制工作。您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应如何推进？

**张晓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最根本的还是要按照十八届

三中全会的总要求，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为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同时，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的主题是合作，我们要在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大背景下，坚持合作发展观，共建共享，互利共赢，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下的制度互补性，顺应湾区发展基本规律，创新合作机制，务实推进粤港澳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携手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南方》杂志：**粤港澳大湾区包括珠三角9市和香港、澳门，各城市应当如何精准定位、紧密联动、错位发展？

**张晓强：**粤港澳大湾区最核心的四个点，分别是香港、澳门、广州、深圳。

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作用是无法取代的，它的国际自由港地位、营商便利程度、国际化人才，都有优势，特别是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有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应该发挥好香港这些优势。

澳门整体经济总量小，以休闲娱乐为主，可以瞄准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方向去努力。

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是广东省内最大的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对周边地区有很强的辐射带动能力。

深圳的创新改革是其最大优势，将在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体制创新等方面引领大湾区。

总之，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各城市的比较优势，以优化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为重点，推进大湾区内部全面开放与深度合作，推进湾区内部城市由相对简单、松散的联系向深度融合发展，共同培育国

际竞争新优势。

《南方》杂志：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点、难点在哪？如何突破？

张晓强：对标世界高水平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生产要素能否自由高效地流动，是重点难点所在。比方说CEPA实行了多年，国家推出了很多政策，有些方面仍然存在“大门开、小门不开”“玻璃门”“弹簧门”等现象，这还需要破题。

如何突破，最根本的还是要靠体制机制的创新。在互利共赢的前提下，最大程度深化合作，消除不同制度下的边界屏蔽效应，最大程度地发挥整个大湾区的聚集效应、分工效应、协作效应、规模效应，形成区域利益共同体，实现区域利益最大化，尽快打造成国际一流大湾区。

（信息来源：《南方》杂志 2017年第11期）

# 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郑新立

(2017年6月15日)

## 核心要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围绕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实现了一系列新的突破和进展，经济体制更加富有活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广大人民从发展中受益更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彰显出无比强大的生命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国企改革上有三个重大创新。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员工持股。这三项制度创新，是总结实践经验的结果，反映了我们党对国有企业改革认识上的深化，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

■我国在改革中创造出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劳动者资本联合与劳动联合相结合的经济组织形式，属于集体经济的范畴。在这类企业的从业人员，既能拿到工资，又能分到红利，可以很快富裕起来。以华为公司为例，在收入分配中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的比例为3:1，既调动了员工的劳动积极性，又使资本得到合理回报，革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利润分配中资本所得过多即“资本榨取剩余劳动价值”的痼疾，有效避免了收入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问题。也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出现这种注重劳动贡献、兼顾

资本收益的分配模式，具有重大深远的突破性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围绕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实现了一系列新的突破和进展，经济体制更加富有活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广大人民从发展中受益更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彰显出无比强大的生命力。

## 一、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之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基础，是全体人民共同利益所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国企改革上有三个重大创新。

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从管资产为主转变为管资本为主，是管理理念、重点、方式上的新突破，适应了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需要。企业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要求赋予其经营自主权，包括对所占有的生产资料拥有法人财产权。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根据市场竞争的需要，随时处置一些闲置、低效益的资产，或者购进一些新的资产。政府监管部门将实物形态资产的经营管理权交给企业，有利于提高企业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从而把企业做大做强。同时，政府摆脱了对物质资产监管的具体事务，集中精力从价值形态上管好国有资本的配置和保值增值，有利于落实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要求，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这种改变是国有资本管理职能的强化，而不是弱化。

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集体、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建立规范的股份制公司，可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有利于调动各方积极性，并避免内部人控制。国有资本在混合所有制企业控股或参股，根据所占股份的多少拥有不同的投票权，可放大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提高国有资本经营效益。实践证明，混合所有的股份制经济是各类企业中发展最好、最有活力的一种产权组织形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认识的升华。

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企业员工特别是管理层和技术骨干持股，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成为所有者，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有利于员工通过工资和分红增加收入，有利于企业从长远发展出发增加技术研发投入。

这三项制度创新，是总结实践经验的结果，反映了我们党对国有企业改革认识上的深化，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随着各项改革逐步到位，一个全新的所有制结构和高效率的国有经济实现方式将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基将更加稳固。

## 二、创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方式，使之与市场经济相融合

农村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等）归村民集体所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

要特征，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公有制形式。在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必须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主要由市场决定其配置。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如何与市场经济对接，是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用益物权分离的改革方案，在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赋予农户土地的用益物权即法人财产权，允许农户对承包地的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抵押、担保、转让，获得财产性收入。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这就使土地与其他要素一样成为可流动、整合的商品，为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社会化经营打开了方便之门。所不同的是，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必须与用途管制相结合，耕地转变为建设用地时必须依法合规。

推进这项改革，可起到一举三得之功效。一是有利于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土地有了市场交换价值，其财富效应显现出来，农民才会珍惜土地，从而解决农村耕地大量撂荒、宅基地和房产大批闲置的状况。二是可满足城市新增建设用地需要并增加耕地。我国农村宅基地面积达 2.5 亿亩，通过村庄整治搞新农村建设，可减少占地 50% 以上。实行按单位面积产量计算出的标准土地当量推行占补平衡，增加城市住房建设用地供给，可从根本上抑制城市房价上涨，也能有效避免土地占优补劣现象。可适时推广重庆“地票”市场的成功改革经验，抓紧建立全国统一、城乡一体的房地产市场，释放土地利用的巨大潜力，从而适应农民工全国性流动的需要。三是进城落户的农民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并出售其住房，将获得一笔不菲的

收入，相当于得到一笔在城里的安家费。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必然的趋势。应参照试点经验，逐步拆除城乡市场之间的各种藩篱，允许要素在城乡市场之间双向自由流动，改变目前农民房地产只能在集体经济内部流动的状况，在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中使农村的房地产价值得以实现。实践证明，加快农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必须借助市场机制的强大力量，以农村土地用益物权为抵押撬动城市资本下乡。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赋予国有企业所占有的国有资产以法人财产权，解决了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融合问题，解放了潜藏于国有企业的生产力。20年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赋予农户以土地的法人财产权，解决了集体经济与市场经济融合问题，必将又一次极大地解放农村生产力，为补上农村农业这一供给侧结构性短板，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 三、同等保护各类产权，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的迅猛发展已经显示出巨大的活力和创造力，在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满足市场需求、推进技术创新和扩大出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了对发展公有、非公有制经济的两个“毫不动摇”，强调了对公有、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的两个“不可侵犯”，明确提出两种所有制经济受到同等法律保护；提出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的具体办法，鼓励非公有制企业

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所有这些决定，都为非公有制经济创造更为平等的竞争环境，有利于非公有制企业的持续快速发展。近几年，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如允许民营经济进入电信、石化等垄断性行业，允许兴办民营股份制银行，允许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类政府与企业合作（PPP）建设项目，提高对小微企业的税收起征点，通过“营改增”降低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第三产业税收负担，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到海外投资等等，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和市场环境逐步优化。

把非公有制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所决定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现代产权制度理论上的突破和实践上的创新，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在相互竞争中共同发展创造了条件，为国民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特别是鼓励公有、非公有制经济通过相互参股，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把公有制企业实力强大的优势和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的优势结合起来，同时又避免了公有制企业体制僵化和非公有制企业规模较小的弊端，形成  $1+1>2$  的格局。在未来的发展中，混合所有的股份制企业会越来越多，单一所有制的企业将越来越少，大部分企业将在股份制的基础上建立起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将不断增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将建立在更加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

#### 四、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落实共享发展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闭幕时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共享发展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还曾多次强调改革一定要让广大人民有获得感。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

五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收入结构不断优化。通过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使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居民消费保持了较快的增长。从 2011 年到 2015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7.9%，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速度也达到 7.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 9.6%，比经济增长速度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均快了 1.7 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 2011 年的 3.13:1 降为 2015 年的 2.95:1，2016 年又进一步降为 2.7:1。与长期以来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最大拉动力不同，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广大居民切实感受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上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面小康一个也不能少”的指示，我们加大扶贫攻坚力度，财政增加了扶贫支出，各级党委和政府强化了扶贫的责任，同时动员企业和各行各业人士积极投身到扶贫工作中来，确保实现每年脱贫 1000 万人的目标。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创业带动就业，是增加居民收入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发展“互联网+”经济，出现了一批新产业、新业态，网店销售、摩拜单车、网络医疗、网络教育、网络金融等蓬勃发展，我国基于现代通讯网

络所出现的数字经济，已走在世界前列。我国在改革中创造出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劳动者资本联合与劳动联合相结合的经济组织形式，属于集体经济的范畴。这类企业的从业人员，既能拿到工资，又能分到红利，可以很快富裕起来。以华为公司为例，在收入分配中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的比例为 3:1，既调动了员工的劳动积极性，又使资本得到合理回报，革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利润分配中资本所得过多即“资本榨取剩余劳动价值”的痼疾，有效避免了收入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问题。也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出现这种注重劳动贡献、兼顾资本收益的分配模式，具有重大深远的突破性意义。

（信息来源：《求是》2017年第12期）

# 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建设道路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魏建国

(2017年6月2日)

今天很荣幸参加这次高峰论坛。在演讲之前我必须提到一个人，他是美国人，来中国150多次，也正是他对中国的城镇化给予了最大的关注，他就是美国总统特使、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美方首席代表鲍尔森。鲍尔森在他担任财长之后组建了中美第一个城市发展论坛，北京市长和芝加哥市长分别出任论坛主席，该论坛已经办了十个年头，我参加了全部的活动。一个快80岁的美国人把如此大的精力和财力放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尚处在初期阶段的城镇化发展上，他图的是什么？他能得到什么好处？直到前几年美国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讲过一句话我才恍然大悟，他说未来21世纪世界上有两件大事，一件是美国的高科技，一件是中国的城镇化。所以看到了鲍尔森的行动，我才知道鲍尔森做的是件当今全球的大事，一件人类发展历史上的大事，他是值得让人尊敬和骄傲的。

下面，我用10分钟时间讲一个观点，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是当务之急。中国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占全球的五分之三，未来十年这个比例将会变成三分之二。有人问我，中国城镇化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有人说规划不行，中国都强调规划先行，中国的规划永远滞后。有人说产业结构不合理，中国的产业结构从来也没有协调好。还有人说是城市资源的效率利用低，说是体制机制的问题，也有人说缺乏人才，缺乏资金。我说都不对，关键是理念的问

题，说到底是没有走出一条中国的、绿色的城市发展之路。为了说明这个观点，我用三分钟讲三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2013 年中美城市发展论坛，美国费城市市长 32 岁的赖特跳上台，演讲的第一句是你们知道为什么全美选我为美国十大明星市长之首吗？下面没有人回答，安静的很。他接着说，我就用一句话赢得了全面令人羡慕的称赞，把城市的空间和就业让给年轻人，让城市可持续发展。那个市长在费城的城中心周围盖了许多老年公寓、学校，包括健康养老和老年大学，把城市的中心腾给了创新的年轻人，这一根本的改变使费城超过了西雅图，得到了全美创新的桂冠。纵观中国，现象是相反的，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占据了城市中心，不肯到四周更不肯到周围，到了中心的年轻人，更因为家庭的问题、生活的问题、小孩儿的问题，把远在周边甚至西部的老人接来。不应该吗？不，是应该的，但是后果如何，我想大家心中自明。

第二个故事，2014 年鲍尔森领衔的中美城市发展论坛把深圳市评为中国最有活力的城市，许勤市长从鲍尔森手里接过奖杯，鲍尔森说我们没有看到政府公布的数据，也没有看到深圳当地电视媒体的报道，我们派出了调查组悄悄的进入深圳的企业，从当地的外来工和住户了解，得出结论，深圳真是一片创新的土壤，环境很好。确实正是有了这个创新的土壤，让华为、中兴、比亚迪等一大批创新的种子，不仅有了气候、水分和阳光，更重要的有了肥料。今天我们是在陕西宾馆开会，26 年前我到过这儿，我的身份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经贸委主任兼党组书记，当时的新疆书记是宋汉良，根

据西北八省市的会议决定，丈八沟要作为一片农村，如今已经被高楼包围。如果仅仅只是被高楼包围，在座的要培养出高楼周围有创新发展的土壤以及政府提供的服务环境和阳光，这才是主要的。所以我把软件创新中心示范城市放在了西安。

第三个故事，刚刚在北京闭幕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来了 1500 位代表，150 多个国家，29 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70 多个国际组织和联合国组织的代表，4000 多名国内外记者。我参与了智库论坛以及整个论坛的筹备工作，也参加了论坛的全部会议晚宴和演出。这次会议无疑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对城市来讲，令人感叹的是，也是我最受感动的是，举办这样大的一个国际活动，解放以来最大的主场外交活动，没有封路，没有戒严，没有放假，没有扰民，一句话，一切的生活、市民的生活照旧，工作照旧、学习照旧，幼儿园、小学中学照旧。这是我参加无数国际活动中没有遇到过的，老百姓交口称赞。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好的效果呢？一句话，北京的副中心起了作用，如果未来雄安新区早日建成，北京的首都效应更显突出。

讲以上三个小故事说明什么呢？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

第一，过去 30 年中国的造城运动是沿袭西方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这种摊大饼式的平面扩张，造成千城一面的城市景观，形成的交通堵塞、环境恶化、购物困难，无从形成一种灵性、舒适、幸福感的发展，现在外国人都不要了，我们难道还要接过来吗？

第二，现在我们城市发展到了深刻反思的阶段，城市的发展千

万不能看速度，我们要看质量，要以人为本，以人的生活质量来衡量城市化发展。我们现在反思改正的越深刻、越彻底，中国城市化发展将会越健康、越生态、越和谐。

第三，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城市化发展道路，需要抓住什么才能纲举目张指引全局呢？今后有三步棋要走。

一是理念上，一定要按照联合国人居署宣布的那样，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健康、安全、幸福、充满希望和美满生活的地方。

二是具体做法上，要落实 201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打造一个经济有效率、发展可持续、社会有包容、环境有健康的新型城市化模式。

三是当下我们要处理好四个关系。第一个是行政体制的关系。城市的行政体制建设关系整个城市的发展和可持续，我们应该在坚持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市区两级管理，发展社区三种行政模式，公共服务下沉社区，这是当前应该采取的走中国式特色的城市发展模式，不要采取一些专家提出的老城区、新城区。第二个是城市的发展和农村发展的关系。我们必须解决长期以来以农村的思维来规划和城市建设的思路，彻底解决城乡一体化发展。城市发展先于乡村农村的发展是不对的，我们现在的软肋就是城市的发展太超前。第三个是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城市群，把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真正的转给周边的城市。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提过看法，湾区建设、现代化城市群，我们的市长没有把蛋黄的效应分给蛋白，过去城市之间强调相互竞争的要彻底解决，要强调优势互补，解决中国城市图纸化问题，

形成一个共商、共建、共享的城市群。

以五大发展理念统领城市发展，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我认为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最重要，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创新是方向，要瞄准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全面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创新发展居于首要位置，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我最后用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演讲，世界上多数人都是在看到以后才相信，只有少数人是相信了，尽管这个事物还没有出现，他们看见了。基于这样，美国出现了乔布斯、比尔·盖茨，中国出现了马云、马化腾。新型城镇化的建设道路也是如此，世界上多数人都按照现有的答案在办事，只有少数人虽然知道已有现成的答案，但是仍然在苦苦的追寻和探索新的答案、新的法则和新的游戏规则。

（信息来源：“新型城镇化建设高峰论坛”演讲辞 2017年6月2日）

# 走向中美关系新时代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陈文玲

(2017年6月)

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已逾半年。对于他当政之后中美两国关系的走向，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就此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

##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内的变化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特朗普执政后在内政、外交上采取的行动，这些行动表明美国的国内政策有哪些变化？这种变化说明了什么？

**陈文玲：**特朗普执政以来内政、外交政策的变化很大。从内政方面来看，他采取了五个大规模行动。

### 1. 大规模进行非理性贸易保护主义

一是特朗普上台第一天就废除 TPP，导致美国的对外贸易从多边转向双边，但是双边现在还没有真正开启，多边基本上废除。二是推行“雇美国人，买美国货”。三是签署行政命令，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筑墙。四是对进口商品高征税，包括在国外加工的返销到美国的产品，都要征 25% 的税收，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最高的进口税。可以说，特朗普竞选时，这些非理性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主张，基本上都兑现了。

### 2. 大规模负债，继续增加债务

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 2016 年 6 月底，美国债务总额已达 22.8 万亿美元。截至今年 1 月 9 日美国对外公布的国家债务是 19.95 万

亿美元。特朗普执政之后再增加 1 万亿美元债务的计划已被批准。

### 3. 大规模行动，大规模重振制造业

主要表现为“四方面放松”一是放松对环保的管制。特朗普在总统就职演说中提出，要环保总署退出《巴黎协定》，撤销美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在未来十年减排 32%。目的是促使传统产业，包括高耗能、高排放的产业重新复兴。二是放松对传统能源的管制，特别是化石能源，也就是煤炭。促使传统的化石能源行业重新振兴。三是放松对医药管理。以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对药品管制最严，特朗普提出要对药品的生产和制药商放松管制。四是放松对金融的管制，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

### 4. 大规模减税

特朗普已经采取了行动，把企业所得税从最高的 35% 减到 15%，个人所得税从原来的 7 档降为现在的 3 档，分别为 35%、25% 和 10%。美国大规模减税也是各国企业非常关注的焦点，因为这个减税力度意味着美国将成为全世界企业税负最低的国家。

### 5. 大规模增加军费

2016 年，美国的军费开支占全世界军费总支出的 50%，比中国、德国、英国和日本四个国家军费的总和还多。特朗普政府近日公布 2017 年度国防预算案，将美国军费开支大幅度增长 10%，总额超过 6000 亿美元。

**记者：**您怎么判断特朗普“五个大规模”行动的动机或目标？

**陈文玲：**特朗普执政之后采取的五个大规模行动，体现出美国在这五个方面的政策取向和行动是很清晰的。就是说特朗普采取的

所有政策虽然和奥巴马都不一样，在与奥巴马切割，但结果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其政策导向和目标就是 12 个字：放大存量霸权、创造增量霸权。

如特朗普总统高调说美国优先，美国第一，让美国再次强大，这是要放大存量霸权。如大规模增加军费，是增强美国的军事霸权；放松金融管制，是要继续强化美国金融在世界上的优势，强化美元霸权；减税是要使美国成为吸收投资、产业与人才的新的高地，强化经济霸权等。

同时，特朗普也在创造增量霸权。如特朗普在推特上说，如果世界各国的投资者都到美国来投资，新创造的税收足以抵补原来要增加的债务。当美国成为产业集聚和人才集聚的高地，美国原有的霸权会产生巨大的增量。

特朗普从一个政治素人，就是他没有执过政，现在正在向一个美国国家领导人，代表美国大国的政治家转变，一方面他在学习、适应如何当总统，另一方面也在用他的商业智慧和效率创造未来。

### 中美两国间关系能不能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记者：**您认为中美两国关系应如何走出修昔底德陷阱？

**陈文玲：**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太平洋足够大，可以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中美两国完全可以走出“修昔底德陷阱”。习近平主席这里讲的“修昔底德陷阱”，是指古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公元前 431 年到 404 年斯巴达与雅典展开的战争的一个概括，这个战争是你输我赢、你死我活。也就是说，一个支配型的大国和一个新崛起的国家，必须是新崛起的国家战胜了支配型大国，才能成为

一个新兴大国。现在中美两国之间的互动，更多的是良性互动，即合作性博弈替代对抗性的博弈可能性更大。中美之间，对世界上很多焦点问题、难点问题和战略性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在各国领导人里各种互动是最多的之一，作为一个国家来说，这是保持中美两个大国关系走向的决定性因素。换句话说，未来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取决于决策者，当然也取决于民意，取决于两国之间相互互动和交融的关系。当前，中美之间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大家都知道，中美之间 2016 年的贸易额是 5196 亿美元，在所有国家中贸易额排在第二位的，第一位是欧盟，欧盟是 28 个国家，但美国是一个单一的国家。按照单一国家来说，美国还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中国现在对美国的出口额比中美建交的时候扩大了 210 倍。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通话的时候，强调中美加强合作的必要性、紧迫性进一步上升。他特别提出，搞好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中美两个大国对世界应有的担当。在习特海湖庄园会晤的时候，习近平主席特别提出：我们有一千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习近平主席对中美关系的定调，是推动中美朝着一个可预期的、可持续的、良性的互动方向发展，进一步把中美关系搞好。从两国领导人的互动来说，习近平与特朗普首次会晤期间，中美双方宣布建立外交安全、全面经济、执法及网络安全、社会和人文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之后中美共同磋商的“百日计划”中关于解决中美经贸关系的十个措施，都是在实实在在地解决中美之间存在矛盾和问题的具体行动。

记者：中美关系对整个世界局势发展意味着什么？

陈文玲：我个人认为，将来我们再看中美关系发展进程的时候，当前将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1.超出了双边主义，超出了双边意义

现在看起来是处理中美关系，但实际上中美关系关系到世界局势。现在中国GDP排第二，美国GDP排第一；中国制造业排第一，占世界比重近30%，美国排第二；贸易中国是第一，美国第二。一个是最发达的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和则世界兴，中美斗则世界衰。

2.超出当代的意义，会对未来产生持续的影响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到中国来访的时候，曾说特朗普总统提出，要考虑构建未来50年的中美关系。蒂勒森在和王毅外长会谈的时候，在和习近平主席会见谈话的时候，反复强调在处理中美关系时，用的就是习主席在2012年提出来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内涵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对这个概念蒂勒森表述过两次。这某种程度上说明特朗普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已经接受了。所以从历史的长周期来看，这超出了当代的意义，应该是一个转折点。

3.超出了经济的意义，即不仅仅是要确立中国和美国的经贸关系，可能还会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各方面开创一个崭新的、超越冷战思维和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中美关系

记者：中美关系又将面临哪些挑战呢？

陈文玲：当然，中美关系也面临很大的挑战，有很大的不确定

性，但从特朗普竞选到当选总统，到他现在执政情况来看，我个人认为，特朗普总统还是言必信、行必果的。听其言、观其行，他的行动和所表述的基本是一致的，当然他遇到了很大阻力，他遇到了阻力但还在往前走。特朗普和一般政治家不同的是，他具有企业家的韧性，这种在市场上经过反复摔打锤炼的韧性，在他治理国家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

### 1. 特朗普对中国的善意和态度，还有待于进一步释放成制度性的安排和长周期的中美关系的构建

正像蒂勒森所传递的，建立面向未来 50 年的中美关系，并形成一个制度框架，那么我认为这个总统在中美关系历史上就是很伟大的。中美关系和中美两个国家都正处在历史转折关头，对中国来说正在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与此同时，在美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封闭主义的情况下，中国反其道而行之，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建设者，甚至将要成为引领者。中美两国地位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正好是交错或者是颠倒过来。

### 2. 中国真正在为经济全球化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产品”

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贸易便利化、自由化，提出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包括在 G20 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形成的框架、建议和声明，都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前沿，发挥中国一个新兴大国的担当和作用。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世界选择了中国，因为世界的潮流是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合作，是各个国家能够结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共同建设一个超越冷战思维、南北思维的新世界。中国正好顺应了这个潮流。

美国从 2008 年到现在，遇到了一系列问题，而且由于美国的问题，导致了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长时期的低速增长，还有贸易的低速增长。2016 年全球贸易增长 1.7%，今年修改后预期是 2.4%，仍低于经济增速，今年经济增速预期是 3.4%。国际贸易和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它的动力在下降，“肇事者”是美国，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了现在世界经济的长周期低迷。

3.中国代表的是一种历史发展的方向，是一种时代的潮流，是一种民心所向

美国原来是经济全球化的旗手，推动了贸易的便利化、自由化，二战之后推动建立了联合国、形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相关国际机构，重建有利于全球发展的国际秩序，使世界保持了 60 年的增长。那个时候美国代表了时代潮流，代表了发展的方向，是引领者，一直引领了这么多年。现在历史又惊人的相似，世界又处在类似当时的情况。中国一方面要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另一方面还要担当更多的历史责任，要向全世界，向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公共品，如“一带一路”就是中国方案、中国倡议、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品。这种历史的交错和历史的演化，在当前是非常深刻的，这种调整也是非常重大的。

### 中美两国间利益的交汇点

记者：您认为现在中美两国间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请您谈谈中美两国间有哪些利益的交汇点？

陈文玲：中美两国之间如何找到利益的交汇点，如何实现真正的互利共赢，有些问题需要深入思考。如美国提出的重振制造业，

中国制造业现在占世界的比重接近 30%，中国制造业有 39 个大项、191 个中项和 525 个小项，是全世界制造业体系最完善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制造业完全可以互补，甚至可以互换。因为全球价值链是跨国界的，可以把我国的优势产业形成全球价值链；同样，美国高端制造业产业链也是在全球，如波音飞机，中国有多个波音飞机零部件制造基地，如果美国把国门关上，和中国制造业就不能产生良性互动。再比如投资，美国现在的债务约为 20 万亿美元，如果再加上今年新增的 1 万亿美元债务，再加上未来十年 1 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将达到 22 万亿美元。实际上现在美国的投资能力和中国差距很大，我国 2016 年基础设施投资为 1.75 万亿美元，制造业投资是 2.76 万亿美元，这两项投资约为 4 万亿美元。所以在投资方面，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美之间的利益交汇点非常多。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工程承包集团，世界十大工程承包企业中前八位都是中国的。

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中美之间也有利益交汇点。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和我国“一带一路”交汇点是非常多的，这也是美国派工作组来参加“一带一路”会议的原因之一，因为看到了利益交汇点。美国原来对中国限制出口高科技产品，但是美国这种限制，实质上是限制了美国高技术产品市场的放大，是自损八百。

就机器人来说，现在世界家政机器人方面生产能力最强的是日本，高技术机器人生产能力强的是美国、德国。虽然我国也有几百家的生产企业，但大部分处于中低端产业。中国是一个巨大市场。

美国的高端产业和中国的中低端产业可以形成产业链，实行互补。我国现在处于产业链高端的，如高铁有成套设备可以输出，特朗普提出要修高铁，完全可以与中国合作，重新链接和形成新的产业布局。在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国，我国都建有高铁机车的生产厂，与我国国内形成了产业链链接。中美之间也可以重构产业链，形成新的优势互补的产业体系。

中美之间只要有一个正确的思路和美好的愿景展望，并采取实实在在的行动，中美两国关系就能向好的方面发展；面对的问题如果用诚意解决，不是用冷战思维来考虑，有很多问题也能迎刃而解。

记者：请您综合判断一下中美关系的发展？

中美两国关系，总体上是看好的，我对当前的中美关系评价是积极的，是正面的，我希望也非常期待有更好的中美关系，既对中美两国有利，对全世界、对全人类、对未来的历史也是一个最正面的回答。中美两国应携手走进新时代。

（信息来源：《中国国情国力》2017年第7期）

## [成果摘要]

# 《研究报告》2017年第25期

## 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营商环境比较分析与启示

**【摘要】**当前，我国吸引外商投资正面临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低收入国家成本优势带来的双重挤压。在此背景下，我国可借鉴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在创建开放自由的投资环境、吸引外商投资的税收优惠、高效便捷的政府服务以及高效廉洁的法制环境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对照印度营商环境存在的不足，按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原则，尽快建设和完善与国际接轨的外商投资法律制度，推进更加自由的投资环境建设，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为企业“降成本”做好“减法”，积极营造公平竞争、宽松有序的投资环境。

（作者：李娣）

# 《研究报告》2017年第26期

## 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的政策建议

**【摘要】**贫困户通过自己发展项目脱贫受其劳动技能和经营水平等的限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则可有效带动贫困户脱贫，因此，完善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应该成为金融扶贫的主要方式。当前，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还存在机构涉贫涉农浅，

技术创新弱，信用体系和担保体系不健全，支持政策的科学性、精准性和差异性不足等问题。建议未来在建立多层次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多样化的金融技术产品体系、广覆盖的信用和担保体系、梯次性的财税政策体系等方面，谋求更多突破。（作者：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中国普惠金融促进会筹备小组扶贫金融调研组）

## 《研究报告》2017年第27期

### 我国政务大数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摘要】**近年来，我国依托国家电子政务外网，大数据基础设施和应用起步良好，各个城市因城施策实施大数据行动计划。本文通过对中央和部分地方政府政务大数据建设情况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大数据网络建设依然存在数据共享不充分、大数据思维缺乏、大数据法律法规不健全、大数据人才不足和信息安全隐患等问题。建议完善大数据政策法规、加快大数据统一平台建设、加强数据开放共享、推进政务数据面向社会开放和强化大数据安全。

（作者：武锋 张影强）

## 《研究报告》2017年第28期

### 以农业地理集聚为抓手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摘要】**实践表明，源于农业内部分工的产业效率提升，需要借助于农业生产活动的地理集聚这种空间组织形态来实现。因此，有必要将促进农业地理集聚作为我国农业政策的重要抓手，通过引导和规范农业发展的地理格局，发展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协调的农业生产、产业和经营体系，充分培育和利用农业地理集聚所产生的空间外部性积极因素，加强交通运输网络与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进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者：肖卫东 詹琳）

## 《研究报告》2017年第29期

### 巩固我国贫困地区退耕还林政策成果的建议

**【摘要】**自实施以来，退耕还林作为我国生态保护与精准扶贫有机结合的重要工程取得良好成效。目前，前一轮工程补助逐渐到期，后续政策尚未落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扶贫攻坚与退耕还林政策的效果。因此，建议继续延长贫困地区退耕还林的补助期限，动态调整其补助标准，推进建立贫困地区退耕还林长效管护机制，转变后续产业的扶持方式，探索对贫困地区退耕还林进行跨区补偿，以巩固我国贫困地区退耕还林政策效果。（作者：詹琳）

# 《研究报告》2017年第30期

## 特朗普减税带来的挑战及对策建议

**【摘要】**特朗普减税方案主要集中在降低企业税率、降低个人税负、增加海外税收三个方面。其税改目的是增强企业税收的国际竞争力，吸引美国企业回归及内外资企业投资，刺激美国经济增长。减税方案若实施将对中国资金的流向产生影响，并对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形成挑战。对此，我国需要采取有效的战略对策，包括调整税制结构、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改善投资环境和促进民间投资增长。

(作者：徐伟)

## [国际交流]

6月20日，曾培炎理事长、张晓强常务副理事长、魏建国副理事长参加李克强总理会见第九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美方代表。

6月20-21日，曾培炎理事长出席在北京瑞吉酒店举办的第九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并在开幕式上致辞，张晓强常务副理事长作为正式代表参会并主持开幕式。中美双方代表就中美及全球宏观经济、中美宏观经济调控、中美经贸关系新路径及基础设施合作等重要问题进行深入交流。魏建国副理事长和张大卫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出席会议并分别主持欢迎晚宴和午餐会。陈文玲总经济师作为中方代表参会。

6月14日，国经中心顾问、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率国内智库代表团，在美国纽约与美国亚洲协会举行中美高端经贸对话会。魏建国副理事长、陈文玲总经济师等参会。

6月13-14日，王春正主任赴香港出席“中国对外投资趋势与香港的角色”——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高峰论坛并做主旨演讲。

6月14日，张晓强常务副理事长会见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秘书

长棕田哲史，就第三轮中日企业家和前高官对话及专题交流会筹备工作交换意见。

本期责编：胡敏一

---

通讯地址：北京市永定门内大街 5 号

邮编：100050

联系电话：010-83362170 传真：010-83362176

网站：[www.cciee.org.cn](http://www.cciee.org.cn)

---